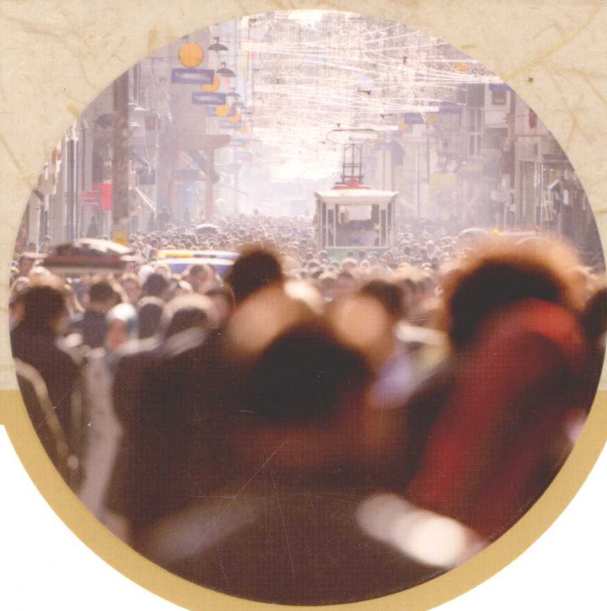


城镇化过程中 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研究

Chengzhenhua Guocheng Zhong
Nongcun Renli Ziben Xingcheng Yanjiu

李云森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城镇化过程中 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研究

李云森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研究/李云森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615-5643-6

I. ①城… II. ①李… III. ①农村-人力资本-研究-中国 IV. ①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961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195 千字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儿童产生	1
(二)留守儿童现状	2
二、研究内容	4
三、本书结构	5

第一部分 父母外出与农村人力资本形成

第一章 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	9
一、引言	9
二、文献综述	13
三、计量分析方法	15
四、数据说明和统计描述	20
五、估计结果	24
(一)父母外出对孩子语文成绩的影响	25
(二)父母外出对孩子数学成绩的影响	27
(三)处理组和控制组平衡性检验	28
六、稳健性分析	30
(一)不同成绩分位数以及标准化成绩的估计结果	31

(二)Rosenbaum 边界估计结果	32
七、总结和评述	34
第二章 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认知能力发展	38
一、引言	38
二、计量经济方法	40
三、数据说明和统计描述	40
四、估计结果	45
五、稳健性分析	48
(一)不同成绩分位数以及标准化成绩的估计结果	48
(二)Rosenbaum 边界估计结果	49
六、总结和评述	51
第三章 父亲非农就业对农村孩子终身教育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54
一、引言	54
二、模型设定	55
三、数据和统计描述	56
四、估计结果	59
(一)基本估计结果	59
(二)不同类型家庭中的差异	61
五、父亲非农就业影响的代际差异估计	64
六、总结与评述	67

第二部分 父母外出影响孩子人力资本形成的机制

第四章 中国农村教育的代际因果关系	73
一、引言	73
二、文献回顾	77

三、“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及其影响·····	83
(一)“文革”期间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	83
(二)基础教育普及运动对父母教育的影响·····	89
四、计量分析方法·····	93
五、数据描述·····	95
(一)样本和样本均值·····	95
(二)限制样本·····	100
六、估计结果·····	102
(一)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102
(二)受限制样本的估计结果·····	105
(三)把父母的教育都放在同一回归方程中·····	107
(四)其他变量估计结果的解释·····	108
(五)分儿子和女儿样本估计·····	109
七、稳健性检验和方程设定检验·····	111
(一)父母入学年龄假设问题·····	111
(二)样本选择问题·····	115
(三)方程设定:以孩子教育年限作为因变量·····	125
八、结果解释和讨论·····	128
(一)母亲对父亲家庭的选择对孩子教育的影响·····	129
(二)母亲的选择性婚姻行为·····	131
(三)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权衡·····	133
九、结论·····	134
第五章 妇女议价能力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	139
一、引言·····	139
二、理论基础·····	141
三、计量经济模型·····	144

四、数据和数据描述	146
五、估计结果	149
六、稳健性检验	154
七、总结和政策建议	157
参考文献	159
后 记	175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留守儿童产生

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工作的直接作用是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以及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落后,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

略。为配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实施了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蔡昉等,2001)。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由于这种历史原因,我国城乡的公共服务对象都有严格的限制。即农民以及其后代无法在城市享受城市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卫生。也就是说,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不能在城市就读当地的学校。这种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的“亲子分离”,无疑会严重影响农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

根据已有的研究,拥有农业户口的个人在城镇劳动力市场遭遇了严重的歧视(Meng and Zhang,2001;王美艳,2003,2005;邢春冰,2008;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章元和王昊,2011;章元和高汉,2011;刘亮等,2012)。这种歧视可能对农村人力资本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歧视不仅扭曲了要素价格,使得个人无法对人力资本做出正确的评价,从而对自身以及后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力市场歧视可能使得农民工劳动所得无法支持其一家人的流动。由于户籍歧视,农民工在市场进入方面存在障碍,这表现在农民工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显著不如城镇居民(陈钊等,2009),这是导致其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留守儿童的产生可能来自劳动力市场歧视的间接影响。

(二)留守儿童现状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留守儿童规模巨大。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认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大概在1 981万;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研究则表明,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上升到5 861万(段成荣和杨舸,2008);而使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则表明,农村0~17岁留守儿童数据为6 102.55万(段成荣等,2013)。与此同时,留守儿童占有儿童比例则从2000年的8.05%上升到2005年的21.72%。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①,从省份分布看,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

^① 这部分数据来自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王宗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学刊,2013(2):37-48.

徽、江西、广西、广东和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从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比例看,超过 50% 的有江苏(51.56%)、安徽(53.49%)、江西(51.47%)、湖南(51.14%)、重庆(66.52%)和四川(54.45%)。广西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比例也高达 48.59%。从接受教育的情况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有 3.38% 的农村留守儿童没有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尤其是在母亲外出与父亲居住的留守儿童,不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高达 5.12%。从父母外出模式看,46.47% 的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而在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单独居住比例为 3.37%,其绝对数值高达 205.7 万。

叶敬忠和潘璐(2008)调查了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这五个劳务输出大省 10 个村 400 名留守儿童,结果表明,有 72.3% 的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务工。在留守儿童外出父母中,72.1% 的父亲和 73.2% 的母亲每年在外时间为 10~12 个月;78.6% 的父亲和 80.7% 的母亲在省外务工;34.4% 的父亲和 32.9% 的母亲在儿童 3 岁之前就开始外出,48.5% 的父亲和 43.7% 的母亲外出年限在 7 年以上。但是不同地区之间,留守儿童背景特征存在巨大差异。在有些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外出的比例仅为 41.9%,但是在有些村中这个比例高达 100%。

亲子分离的家庭结构可能会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考虑到教育是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最重要的人力资本(Becker and Chiswick, 1966; Mincer, 1974),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人劳动力市场表现。这必将导致个人收入差异的扩大,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一些研究还认为,教育是个人生产力的关键信号,公司根据教育水平识别劳动力的质量并给予相应的安排(Sepence, 1973; Stiglitz, 1975)。拥有教育水平的不足将导致留守儿童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拥有较低教育水平并不是因为其能力方面的不足,而是因为成长环境以及家庭结构的原因。

所幸的是,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指出,自从 2001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 年)》以来,“我国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儿童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儿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 2010 年,‘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但是,“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流动带来的儿童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未来的十年中,

我国要“基本满足流动和留守儿童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建立和完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服务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将流动人口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登记制度，为流动儿童享有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服务提供基础。整合社区资源，完善以社区为依托，面向流动人口家庭的管理和服务网络，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和行为为指导，提高留守儿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责任”。

二、研究内容

本书将全面研究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本书将研究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影响的三个方面，包括当下学习表现、当下认知能力测试成绩以及终身教育水平。

第一方面是留守儿童的学习表现问题。已有的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可能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Kandel and Kao, 2001; McKenzie and Rapoport, 2010; Robles and Oropesa, 2011)。但是国内的研究表明在考虑了汇款因素后，这种影响可能是不重要的(胡枫和李善同, 2009)。应用倾向分数估计方法，本书估计了父母外出对孩子学习表现的影响。

第二方面是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问题。最新的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Heck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拓展了经典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范围，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教育与健康，还应该包括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尤其是非认知能力，包括工作的积极性、领导能力、忠诚度、可靠性、毅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等(Almlund et al., 2011)。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在决定个人收入以及个人在社会上其他方面的成功中都起着与教育以及认知能力一样重要的作用(Bowles et al., 2001; Heckman et al., 2006; Heineck and Anger, 2010)，一些研究甚至认为个人的非认知能力一定程度上比认知能力更重要

(Bowles and Nelson, 1974; Bowles and Gintis, 2002; Heckman et al., 2006), 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来说尤为如此(Lindqvist and Vestman, 2011)。这第二个方面的研究也是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展开的初步研究。

第三方面是父母非农就业对孩子终身教育的影响。本书第三章将使用历史回顾数据,研究子女 14 岁时父亲非农工作状态对子女最终教育年限以及教育水平的影响。

本书接着研究了父母外出影响孩子教育的机制。首先的一个机制是父母教育与孩子教育的因果关系机制,即父母教育在家庭内部的外溢效应,而父母外出可能割裂了这种因果关系作用机制。根据国外的研究,父母的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较大的影响(Behrman and Rosenzweig, 2002; Plug, 2004; Black et al., 2005; Oreopoulos et al., 2006)。考虑到父母可能通过遗传因素影响孩子教育水平,我们需要控制这种因素的影响。在第四章中,本书使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教育普及政策来控制父母的遗传性因素的影响,以此观察父母教育的作用。

第二个机制是妇女经济地位与家庭的孩子教育投资。本书在第五章将首先基于一个非合作博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妇女经济地位(妇女的相对收入)提高会提高家庭公共品(孩子教育)投资;然后从数据实证角度证明,妇女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确会提高家庭中的孩子教育投资。考虑到我国外出家庭以男性外出为主,这可能导致了家庭在非公共品投资上的倾斜,即可能会导致家庭中孩子教育投资相对下降,从而间接影响孩子教育。

三、本书结构

根据本书的研究内容以及目标,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将首先讨论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本部分将分三个章节深入探讨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的影响。

第一章研究父母外出对孩子学习表现的影响。虽然已经有不少研究讨论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没有考虑父母外出的自选择问题(外出的父母都是最想外出同时也是最有能力外出的父母)。考虑到父母外出的自选择问题,本书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匹配父母外出家庭的孩子以及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孩子,然后比较他们在学习上的差异。

第二章研究父母外出对孩子认知能力的影响。与第一章一样,本章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这个问题。认知能力既是孩子学习教育的基础,同时也会受到孩子所接受的教育的影响。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孩子的认知能力表现既是父母外出影响的结果,也可能会受到父母外出对孩子教育学习的影响,同时还会进一步加强父母外出的影响。

第三章研究父母外出对孩子终身教育的影响。不同于已有的文献研究,本章将使用个人历史回忆数据,研究父母外出对孩子终身教育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不同时期我国教育政策的不同,本章还依据个人的年龄划分个人接受教育的时期,分析父母外出影响的代际差异。

第二部分主要研究父母外出影响孩子人力资本形成的机制。本部分将分两章从两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

第四章研究父母教育与孩子教育的关系。本章将论证父母教育与孩子教育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提高父母教育水平是否一定会提高孩子教育水平。如果父母教育在家庭内部存在溢出效应,那么在排除遗传因素之后,父母教育对孩子教育应该有积极作用。但是父母外出有可能削弱这种影响,从而导致父母外出家庭孩子学习成绩不如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孩子。

第五章研究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本章首先从博弈论的角度论证妇女家庭经济地位越高,家庭会越重视孩子的教育投资。考虑到实际上农村外出家庭以父亲外出为主,这意味着这个家庭的孩子教育投资反而可能不如父母不外出家庭,从而导致孩子在教育方面比不上其同龄人。由于没有直接的关于农村妇女的收入数据,因此本章将使用城镇数据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

A decorative grid of dots arranged in 6 rows and 6 columns, located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第一部分

父母外出与农村 人力资本形成



第

一

章

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 学习表现^①

一、引言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由此导致在中国广阔的农村里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认为,留守儿童是指父母有一方或者两方外出,而其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从而不能与其父母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儿童(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是当前我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但是由于城乡户籍隔离等制度原因,农村进城的流动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遇到较多的困难和障碍。这导致了父母外出打工的同时其子女被留在了农村以方便他们在农村接受相应的教育。当然导致留守儿童产生还有其他原因。关于留守儿童的规模,文献中并没有统一的估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在调研江苏、甘肃和河北三省五个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为:在7~18周岁的儿童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为47.7%(吴霓等,2004)。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依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认为留守儿童总量为2 290.45万人,占全国儿童总数的8.05%^②。不

① 本章和下一章主要内容以《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的调查的实证研究》为题目发笔在《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2期上。内容有增删。在此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② 不过这两者对留守儿童年龄的定义有所不同。比如在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的研究中,留守儿童定义为14岁以下的儿童,而且这是全国的数据。

管依据哪个研究结果,都可以看出,留守儿童的规模相当可观,他们的成长必将会对农村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深入研究父母外出如何影响留守儿童成长尤其是其教育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社会学文献普遍认为父母外出会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各种不利的影响。比如吴霓等(2004)认为父母外出可能会导致监护人对孩子学习关注过少从而使得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下降。段成荣和周福林(2005)发现留守儿童中有56.17%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而父母一方或者两方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的缺席还可能会导致孩子在生活以及心理上产生各种问题。周宗奎等(2005)在湖北省三个县市进行的实地调研发现,留守儿童在一般印象、学习、品行以及情绪感受上的问题比父母在家的儿童严重,比如60%以上接受调查的教师认为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后学习成绩以及品行都显著降低,而这些在小学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学生的自我报告也表明留守儿童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自信心方面显著不如父母在家的儿童。由此可见,除了监护人关注不足会直接影响孩子学习外,父母外出对孩子心理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会对孩子的学习产生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还主要是定性的分析,对于父母外出如何影响留守儿童的成长还需要有直观的量化结论。本章的目的就是应用计量经济方法定量分析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学习表现的影响。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孩子当前的学习表现除了直接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外,还可能会直接影响其未来最终的教育水平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

综合已有的研究,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影响可能有多种渠道,其影响则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第一种是直接的正的代际因果联系。国外的大量研究表明,在控制了遗传因素的情况下,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孩子的教育水平相应越高,尤其是母亲教育对孩子教育存在显著的正的影响(Behrman and Rosenzweig, 2002; Plug, 2004; Black et al., 2005; Oreopoulos et al., 2006)。李云森和齐豪(2011)使用2002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调查,以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农村实施的基础教育普及政策为父母教育的工具变量,研究了